

激进、务实和浪漫： “元老记者”于右任的舆论观

□ 刘 莹

[内容摘要] “元老记者”于右任长期被贴上党派色彩浓重的标签。人们承认于右任的舆论思想和舆论监督实践是激烈的,但又往往认为这种激进是以“政治目的”为出发点。事实上,于右任的舆论观和报刊实践比人们想象的要真诚、彻底也更加理想化,他主张监督的不仅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还包括自己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政府;他希望报刊所代表的是真正的“人民”,虽然这看上去仅仅是一种理想。

[关键词] 于右任;舆论观;舆论监督。

[作者简介] 刘 莹,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新闻学硕士,主要从事新闻史研究。

作为政治家的于右任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影响力媲美美国国家元首。作为新闻人的于右任,则是一个充满革命理想和自由色彩的,将办报和革命结合的社会实践者,享有“元老记者”的盛誉。这样一个人,在中国新闻史上贡献卓越,他的舆论观在当时中国代表了最激进的思想,他的舆论监督实践激进而又克制、务实实际而又充满浪漫的理想化色彩。激进、务实和理想化,这些看似矛盾的特质统一在于右任的舆论观中。

一、激进和浪漫:以代表舆论和舆论监督为报刊天职

于右任舆论观的基点是对报刊舆论作用的高度评价。他办《民呼日报》时说过,报纸“辟淫邪,倡公理,以为舆论之代表”^①,“监观社会之善恶,标示良楛,更从其后而鞭之”是报纸天职之一。他认为,代表舆论并进行舆论监督是报刊的天赋权利。

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在当今新闻界已

取得一定共识。大众传媒在公共领域揭露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阴暗现象,形成社会舆论来监督和制约国家及社会生活中违道德与法规的行为,尤其是限制或减少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促进社会机制的有效运行,即为新闻舆论监督。在于右任之前,梁启超已经论述过“舆论监督”的概念;不同社会环境下的许多近现代报刊也有舆论监督倡导和实践,那么,于右任的舆论观与实践有何独特之处呢?于右任认为,报刊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国民,而监督的对象则是政府。尤其,舆论监督实践力度之大,使梁启超等改良派报刊活动家难以望其项背,甚至可以说远超过当今许多媒体的监督力度。

首先,于右任认为报纸是平民的代表,坚信报刊舆论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在于右任的论述以及“竖三民”的指导性政论中,经常出现“民意”二字。“夫报馆者,故平民之代表也”^②,创办《民呼日报》之初,他

就明确提出报纸要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实现代表民众舆论的途径之一是提供平台使民情得以宣达。于右任强调报纸宣达民情、痛陈民生疾苦的宗旨；应“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近于散漫之同胞……”^③于右任出身寒苦，注意反映民间疾苦。其笔下“扰民”“病民”“剥民”“病商”“死民”等字眼屡屡出现，表达了对百姓疾苦的关心和同情。“为民请命电”是常见标题，他用这种方式直接向政府传达百姓呼声。《民呼日报》创立第二天就刊出松江士绅向官府请求“速颁新币”以使“官民两便”的电报^④，第三天又刊发镇江府旅沪同乡反映地方官员变相收费、民间深受加赋之苦的电报^⑤。《皖人不认赎矿之急电》《旅沪湖北同乡会公电》《晋商请缓印花税之哀声》等文都直接反映民众呼声和民间舆论。

于右任利用报纸“吊民伐罪”，他撰写了《亡国三恶因》《误国三种人》《贵族万能》《议员现象》等一系列评论，鞭挞腐败的清王朝及其无能的贵族和官吏；发表了《输入外货之功臣》《外患发微》《告哀篇》等文章，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及卖国贼的可耻可恨。于右任言辞犀利，笔如利刃，一针见血，代民众发难，说出了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夫报馆者，故平民之代表也”申明了于右任代表民众舆论的办报理念，而这话的后半句则进一步指明“平民者，又与贵族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⑥。既然报纸代表平民舆论，那么必然就要与其对立面即贵族以及代表贵族利益的政府即清廷相对立，顺理成章的，必然过渡到于右任主持舆论的一个核心

点：政府作为报纸监督的对象而存在，报刊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独立的制衡机构。

于右任认为，要防止“为上者”为所欲为，必须进行舆论监督。当时所谓“为上者”即清廷。他针对政府和各部门官员、贵族进行口诛笔伐。《神州日报》和“竖三民”抨击官场和官员的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力度非常大。比如通过论说、纪事、通电等多种形式集中披露抨击，掀起对“卖路贼”汪大燮的批评热潮，使政府迫于压力彻查汪氏。

于右任主持的报纸舆论监督的指向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官场——清廷（政府）。首先不断指斥官场黑暗和官吏腐败，继而更深入地揭露整个朝廷的腐朽没落。通过对制度性问题的揭示，说明清政府已病入膏肓、不堪拯救，彻底否定清朝统治。这种监督对象的转移，可能出自资产阶级革命派应对客观形势变化和开展政治斗争需要的考虑，但更主要的是于右任思想认识转变的反映。他最初对官场攻击是为了鼎革政治，一度寄望用清宦途、开官智的办法来修漏补缺，其后随着认识的深化发展为抨击封建官僚制度，要求推翻满清王朝。

长期以来的中国新闻史上，于右任被认为党派色彩浓重以致以为他办报的唯一目的就是鼓吹革命。这种认识其实是一种误解，对于右任的理念本末倒置了。他主张监督的不仅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还包括自己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政府。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当于右任成为这个政府的实权派官员之后，当革命派报刊已经由原来的“地下”状态转为公开之后，于右任还是主张报纸应该独立地履行社会公器之职责，批评报纸不应该以“一二党派之言论

机关”自居，而应迅速由党派性质蜕变为“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言论机关”^⑦。这时，《民立报》虽然名义上仍是革命派的机关报，但其在精神上已经与机关报相去甚远了。于右任希望政党报刊能够抛弃一党之见，替民众代言，监督政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民立报》在民国初年建都地点、汉冶萍借款等问题上并不能和临时政府保持一致，甚至持公开反对的态度。这一切，都是于右任真诚的浪漫想法，反映了他激进的充满理想色彩的报刊理念。

二、务求实际：讲求引导舆论和“制造舆论”

于右任是一个实践家，实干精神和实用思想决定了其所办报刊具有经世致用的品格。

于右任注重引导舆论推动革命进程。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民立报》就以头号字刊出专电，并专门设立“武昌革命大风暴”专栏，开辟整版篇幅介绍起义进展的相关情况并配图片。10月13日，于右任发表《长江上游之血水》，以激动人心的笔墨写道：“呜呼，蜀江潮接汉江潮，波浪弥天矣……此三日间，天地为之变色矣……革命党者，万恶政府下之产儿。故有倒行逆施之政府，欲求天下不乱而不得。”^⑧辛亥革命中，《民立报》“文字之功，为不可没矣”^⑨。在清末社会转型的这一历史过程中，于右任通过报刊紧扣革命发展脉搏，热情呼唤辛亥革命，直接为促成和推动各省独立以及中国社会变革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

引导舆论是正面的说法，若对舆论的引导过度就会走向反面，变为操纵舆论。由

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革命派报刊有时在引导和操纵之间失去了平衡，极端表现为制造舆论。

报纸可“制造舆论”，这在于右任的舆论观中可以寻到思想依据。他曾评价报刊与舆论的关系，认为：“盖报纸者，舆论之母也，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实之所由生也。”^⑩在这里，他颠倒了报刊和舆论之间的关系，认为报纸可以是舆论的制造者。这种思想反映到实践中，就出现了“制造舆论”的报刊活动。虽然于右任从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汲取营养，客观公正的新闻理念也影响着其办报，但是处于政治斗争浪潮中的革命报刊不得不考虑到政治利益的达成。为揭露官场，他有时会编造一些官吏嫖娼、赌博、吸毒的消息。随革命形势发展更加紧编造“革命谣言”。武昌起义后不久，《民立报》频现各地光复的消息，目的当然是制造舆论以动摇清朝的地方统治。1911年11月7日《民立报》登“北京专电”：北京已为大汉光复，清帝藏匿使馆。清帝退位是在1912年2月12日，这显然是一条虚假信息。当袁世凯大举进攻革命军、革命党节节退败之时，《民立报》北京专电称“袁世凯已被侠士刺死”，还配发一篇短评《汉奸之末路》，伪造袁世凯已死来稳定人心^⑪。

这种表现符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无所不用其极进行宣传的传统，政治家的于右任很可能把革命利益和政治后果摆在首位。先考虑新闻的后果，是不是有利于革命的进程、是不是可以鼓动革命力量，而不是考虑新闻事实的本身。这样的出发点，必然与于右任在指责报刊道听途说等“四弊”时所持有的客观公正的新闻理念产生矛盾，

也导致报刊实践陷入新闻事实和革命利益的选择,在这两者的悖反中,革命报刊倒向了政治目的的一方。这是于右任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报人的选择,也是他经世致用的实际思想的必然取向。

三、勇气:记者负有舆论之责

所有的权利通常都伴随着相应的义务,任何一个以存在权利为前提的言论表达自由的制度,都同时承认义务。这些义务,可以说就是新闻界的责任。既然代表民意进行舆论监督是报刊的权利,那么这也相应成为记者要承担的责任。

于右任认为,报纸“以其性质监督人,而非为人所监督者也,以其地位移人,而非移于人者也”^①。一方面肯定报纸的重要性,另外也表明舆论监督正是记者应尽之责。他认为,记者要作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使上情下达、下情上知。尤其处于外强环伺、国难当头的社会环境中,记者要鼓舞民气、团结民心,监察和引导整个社会的文化、军事、实业等各个方面,从而使民族自立,使国家自强。

在强烈的责任感指引下,于右任的报纸吊民伐罪,遭到很多酷吏劣绅的仇视,有“布散谣言加害本报及访员”者,有“捉拿访员之地”,面对压力和迫害,于右任凛然不畏,决心“自今以往,当于此黑暗之区……加聘访员,实行监督之责任……宁使让官场恨我,不欲使国民弃我也”^②。表达了为国民当喉舌、履行监督责任的决心。这样的豪言壮语化作于右任办报的具体行动,他创办“竖三民”时几次被捕、坐牢、逃亡,却始终不屈服的曲折经历,使这种责任意识得

到了最精彩的演绎。可以说,于右任的报刊舆论观以及在此指导下的舆论监督实践,体现了他胸怀天下的强烈责任感,激荡着一个革命者敢于担当的魄力和激情。

综上所述,于右任的舆论监督思想与他之前的梁启超已有所区别,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谓的监督,以一小批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为主体,将报刊纳入政治层面,代表士大夫阶层来监督政府。于右任发展了这一涵义,把监督政府作为人民的一项神圣权力,而报纸是实施监督的有力武器和工具,代表范围更广的人民来实行这项权力,而不是代表某一政党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样的监督是人民通过报纸进行的对政府的监督。当然,在当时条件下,这样的以人民为主体的舆论监督不可能实现,主要作为理念和思想存在,在其报刊活动中得以零星的实践。作为一个有局限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在一个受制约的时代环境下,于右任的舆论观已经超越了现实。^③

注释:

① ②《民呼日报宣言书》,载《民呼日报》1909年5月15日。

③《中国万岁 民立万岁》,载《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

④《为民请命之电报》,载《民呼日报》1909年5月16日。

⑤《为民请命之电报》,载《民呼日报》1909年5月17日。

⑦《民立报之宣言》,载《民立报》1912年2月23日。

⑧《长江上游之血水》,载《民立报》1911年10月13日。

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35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⑩李良荣:《从“原始失实”到“官方谣言”》,载中华传媒网2006年7月13日。

⑬《想拿访员者看看》,载《民呼日报》1909年7月5日。